

臺灣公共行政領域智識流動的研究： 治理概念擴散與連接之初探*

謝儲鍵**、張鐙文***、陳敦源****

摘要

自 1930 年代，「公共行政」從「政治科學」的領域分離之後，「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持續地備受關注而成為研究主題，對此，Dwight Waldo 便大聲疾呼樹立公共行政之獨特核心價值的必要性，以舒緩自我認同的問題。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初，隨著「治理」時代的來臨，這兩門共生的學科的相互影響，自然就更值得加以關注。

爰此，本研究以當代公共行政炙手可熱的概念—治理，作為觀察公共行政與政治科學之間智識連結的基礎，並聚焦於「誰影響誰」（who influence whom）的課題。藉由回顧臺灣 2001 年到 2017 年政治學門 TSSCI 收錄期刊與治理議題相關之論文，透過後設分析、書目計量學與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試圖回答：1. 治理研究在政治學門的發展趨勢為何？2. 相關作者的屬性為何？3. 從知識轉移的觀點觀察，存在何種智識網絡的結構？以及 4. 公共行政在該智識網絡中的角色與功能？

根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第一，治理概念在 2001-2005 年出現，超過十篇文章

* 本論文曾發表於 2014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評論人謝俊義教授所給予的寶貴建議。同時，作者更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指正，讓本文內容得以更臻完善與周延。

**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暨組織研究及設計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電子郵件：jeffhsieh920@gmail.com。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電子郵件：TWChang0119@gmail.com（通訊作者）。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電子郵件：donc@nccu.edu.tw。

發表於七個主要的 TSSCI 期刊中。第二，治理概念初期（2001-2005 年）由政治科學領域的學者引入，並應用於國際關係與地方政府的研究。然而，在 2011-2017 年，大量的公共行政領域學者投入治理研究，並將其應用於各式各樣的學術議題。第三，透過網絡結構的分析，說明公共行政學者不僅扮演關鍵角色，同時也發揮知識捐客的功能，尤其鑽研於公私合夥與社區治理等議題的公共行政學者，更是舉足輕重。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臺灣公共行政領域在引介治理概念到學術界的過程中，具備十分重要的角色與功能。其藉由知識形塑與轉化的歷程，促成治理概念跨領域的流動，也就是，先將治理概念「內向引進」（inbound）於公共行政領域，接著經歷理論的磨合及融合，再將治理概念「向外輸出」（outbound）至其他相關領域。此一結果，說明公共行政在政治科學的領域中，扮演智識捐客之特殊角色。

關鍵詞：公共行政、知識轉移與分享、後設分析、社會網絡分析、治理

「我們應該滿足於公共行政本質是多元學科以及可能是跨學科的事實嗎？或者我們應該繼續努力於發展一個廣泛的理論？」

Jos C. N. Raadschelders (1999: 281)

壹、緒論

Wilson (1887) 在 1887 年的著作，幾乎被視為是公共行政學科發展的源頭。在文中，Wilson 認為政治與行政的本質與目標有所不同，行政應從政治獨立出來，強調「這類的事務必須加以研究才能克竟全功」。並指出「國家的理念 (idea) 及其隨之而來國家責任的理想 (ideal) 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轉變，而國家的理念其實就是行政的良知 (conscience)。由於每一天都有新的責任等待國家去履行，所以，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清楚地瞭解國家如何去執行這些任務 (Wilson, 1887)」。就此而論，Wilson 的論述點出公共行政研究對於國家發展與政府運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Shafritz, Hyde, and Parkes, 2004)，而成為公共行政研究的濫觴。就此而論，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公共行政研究發展的時間不能算是悠久，只有一百多年的短暫歷史，可是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及耕耘，已經逐漸成長與茁壯，而成為一門專業的領域¹ (Holzer, Gabrielyan, and Yang, 2007; Henry, 2010)。

即便公共行政發展至今，已累積豐碩的成果，而漸趨成熟。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公共行政在發展的過程中，遭遇到不少的

¹ 根據 Henry (1975) 對於公共行政發展的研究，指出公共行政自 1970 年之後，在經歷不同階段的發展，無論是從研究的焦點 (focus) 與定位 (locus)，或是教學課程的內容設計來觀察，公共行政已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研究領域 (epistemological uniqueness of the field)。而晚近國內的研究，也大多使用「領域」或「學科」來形容公共行政 (陳敦源，2012；王光旭，2015；江明修，1997；莊文忠、張順全，2013；陳重安、許成委，2016)。因此，本研究認為從研究方向、教學本質及學者認同來看，公共行政應可被視為獨立的「領域」或「學科」，是以，文中所提及的「領域」及「學科」是指涉相似的概念，但是，採用「領域」來描述公共行政的發展現況，則更為合適與貼切。

困難與挑戰。其中，若干的問題更直接地對於公共行政的存在及價值產生嚴重的威脅，而成為公共行政的發展危機（Golembiewski, 1977; Ostrom, 2008; Raadschelders, 1999; Riccucci, 2010; Waldo, 1968）。Raadschelders（1999）進一步將這些公共行政發展所面臨的危機劃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學術性危機（academic crisis），另一則是存在性危機（existential crisis），並指出若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學術性危機著重知識論層面（epistemological basis）的議題，而存在性危機則是探討學科獨立性的問題；若從實務的角度來看，學術性危機所關注的是公共行政如何被定義？公共行政在國家與社會的定位又是什麼？而存在性危機則是聚焦於政府的道德性權威（moral authority）。是以，公共行政的發展歷程面臨各式各樣的危機，惟有妥善地處理與回應這些挑戰，公共行政方能成為一門健全的學科。

然而，當仔細地回顧公共行政發展的相關研究後，我們發現相較於學術性危機的議題，公共行政的存在性危機則顯得方興未艾，而成為研究公共行政發展上的潛在缺口。例如 Golembiewski（1977）、Ostrom（2008）與 Riccucci（2010）關注於公共行政的知識論與方法論，Raadschelders（1999）與 Waldo（1968）聚焦在公共行政的定義與定位，這些研究都是探討學術性危機的議題。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從學科發展的邏輯來看，惟有先處理與回應學術性危機的根本問題，接著才是探討與釐清後續的存在性危機，從晚近國外公共行政的研究開始討論存在性危機的趨勢（Andrews and Esteve, 2014; Georgiou, 2014），便不難確認這樣的邏輯。

大抵而言，公共行政研究是圍繞著政治—行政二分的概念逐步發展，然而即便如此，政治與行政的關係卻仍然隱晦難明、模糊不清。所以，對於公共行政而言，無論是學術性危機或存在性危機所需關注的主題，都將涉及政治與行政的關係，尤其是在存在性危機的部分。換句話說，在學科認同情結的糾葛之下，政治與行政呈現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而這種難分難捨的曖昧關係，影響著公共行政的發展。在公共行政發展的早期，若干論者便對於公共行政能否成為獨立學科提出質疑，有的直接將公共行政歸類到政治學的次領域，有的則是粗魯地將公共行政排除於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的領域之外（參見 Bushouse et al., 2011）。面對公共行政淪為次等公民的現象，Waldo（1968; 1975）便憂心忡忡地提出警

告，指出公共行政若無法創造自己的核心價值，將無法顯現公共行政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專業與價值。

不可諱言的是，如從實務運作進行觀察，政治與行政是相互連結，難以劃分（Lynch, Omdal, and Cruise, 1997），且行政甚至是鑲嵌於政治的系絡之中（Riccucci, 2010）；不過，若以研究旨趣進行分析，政治與行政雖有所關聯，但兩者各異其趣（Goodnow, 1900; Wilson, 1887），其中，關於探討政府的各項角色與功能（Bevir, 2011a; Frederickson, 1999; Fukuyama, 2013; Peters and Pierre, 1998; Rhodes, 1996），便是公共行政的特殊價值。申言之，政治領域擅長分析大結構的巨觀議題，聚焦在國家意志的表現（Goodnow, 1900），關注的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Easton, 1965），包括何人、何時、如何、獲取資源的結果（Lasswell, 1985），所處理的問題是國家的結構、制度以及與社會的互動。但，行政領域則是擅長處理小規模的微觀議題，聚焦在國家意志的執行（Goodnow, 1900），處理的是政府所面臨的各種挑戰（Waldo, 1968），包括公共政策規劃、制定、執行的過程與成效，以及公共組織或行政官僚在政策制定或執行過程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功能與行為（Frederickson, 1999; Fukuyama, 2013; Raadschelders, 1999）。

承此，在經過長期研究的累積與實務的運作，時至今日，公共行政所強調諸多價值（例如效率、效能、產出等）已經慢慢彰顯其重要性，而這些價值甚至開始與民主的相關理念結合（例如公平、參與及透明等），促使民主行政（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及公共價值（public value）等概念形成，進而形塑出當代公共行政的學科屬性、使命與價值。然而，公共行政若要更進一步的成長，進而奠定自我的學術定位，仍有若干關鍵議題（big issue）需要面對與處理，其中之一就是發掘並建構自己專屬的核心理論（mega theory）（Nesbit, Moulton, Robinson, Smith, DeHart-Davis, Feeney, Gazley, and Hou, 2011），藉此擺脫昔日借用性（Frederickson, 1976）或應用性學科的標籤（Waldo, 1968），而這樣的倡議恰巧與 Raadschelders（1999）所提到存在性危機有所呼應。隨著國內愈來愈多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包括單一領域及跨領域的研究，開始投入於探索與處理存在性危機的議題，並將議題延伸與擴大至跨

學科或跨領域學術社群之間智識互動與流動（陳世榮，2007；袁大鈺、唐牧群，2010；柯佩均、熊瑞梅、盧科位，2012）。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僅提供豐富的理論基礎，也展示多元的分析技術，在這樣的刺激之下，公共行政學者更是應該好好思考如何探索、分析及回應國內公共行政的相關課題。

是以，本研究認為公共行政若能開拓專屬的研究領域，將有助於充實與強化學科的理論基礎，而事實上公共行政近年來也確實朝向這個方向在努力，例如行政倫理（administrative ethics）、行政革新（administrative reform）、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等理論的建立，都可做為此類成果的代表；除此之外，本研究更進一步認為，如果能夠掌握公共行政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並瞭解其是否為其他學科引用或應用的程度，即知識的轉移與分享（knowledge transfer and exchange）的課題（Mitton et al., 2007），特別是關於公共行政與其理論母學（mother plant）之間的知識連結，將有助於說明公共行政的學術定位，同時，展現公共行政的成熟程度。

由於當代環境的驟變，使得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產生變化，對於將國家、社會或兩者互動當作研究對象的學科而言，勢必需重新思考既有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而治理概念的出現，便恰好填補如此的理論空隙。而公共行政作為一門專業的學科或領域，在如此複雜與變動環境中，無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有助釐清與澄化當代政府的角色及功能，同時肩負引導與轉化政府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及互動。正如同 Wilson（1887）的看法，認為公共行政之目的在於瞭解交由政府執行的適當任務為何，以及政府如何有效率、效能的執行相關任務。而 Fukuyama（2013）也提及政府在政策執行的效能與力道，將是影響國家衰敗的關鍵因素，而公共行政恰好可以在此過程中提供政府治理的能量。

為能達成前述之目的，本研究選擇當代炙手可熱的治理概念，作為觀察公共行政與其他學科之間智識連結的基礎。爰此，本研究回顧臺灣 2001 年到 2017 年政治學門 TSSCI 收錄期刊與治理議題相關之論文，透過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書目計量學（bibliometrics）與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簡稱 SNA）等方法，試圖回答：1. 治理研究在政治學門的發展趨勢為何？2. 相關作者的屬性為何？3. 從知識轉移的觀點觀

察，存在何種智識網絡的結構？以及 4. 公共行政在該智識網絡中的角色與功能？整體而言，本研究希冀透過實際資料的佐證，說明在臺灣政治學門中治理概念的擴散與連接，藉此描繪公共行政與其他社會學科之間知識轉移與分享的軌跡，以作為探索與瞭解學科發展的依據。

本文在章節的安排上，首先，說明治理概念與公共行政的連結與其相關特質，並介紹研究跨學科智識連結的相關理論及方法；其次，交代資料來源、資料結構與分析方法；接著，延續前述的設計，應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逐步檢視資料，並透過具象化、圖像式的方式，呈現跨學科之間學術社群的智識網絡結構，以及公共行政在當中的角色；最後，依據研究的各項成果，提出公共行政的未來發展應該注意的事項與相關建議。

貳、文獻回顧

一、治理概念與公共行政

今日，幾乎在所有社會科學領域都能看見治理概念的應用，誠如 Bevir (2011a) 的觀察，「治理」一詞是無所不在的，而 Pollitt 與 Hupe (2011) 也以「神奇的概念」(magic concept) 來形容治理概念的滲透性。大抵而言，這股全球性的治理浪潮，主要依循著全球化與市場化的腳步，逐漸地蔓延到公共組織的運作當中，進而改變政府與其他部門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模式 (Peters and Pierre, 1998)。傳統的看法大多認為政府是公共政策主要的行動者，國家透過各式各樣的權力運作來影響社會，然而，在治理的概念之下，傳統的結構卻產生若干變化，一方面政府角色固然重要，但，只是眾多的行動者之一，另一方面國家仍然握有權力，但，實際的行動卻由其他部門代為執行 (Peters and Pierre, 1998; Bevir, 2011a)。

由此可知，為能因應當代環境的驟變，迫使原先政治（或官僚）體系的運作邏輯必須做出調整與改變，逐漸從統治變成治理 (governing to governance)，或是由政府轉型治理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Rhodes,

1996; Peters and Pierre, 1998)。這樣的變化，或多或少對於國家或政府的運作產生影響與衝擊，致使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需要重新安排或設定。所以，對於將國家或政府當作研究焦點及對象的學科而言，勢必需要重新思考既有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其中，政治與行政相關領域的學科便是首當其衝，而治理概念的出現，恰好填補原先理論的空隙，進而成為炙手可熱的當紅炸子雞。

不過，換個角度思考，治理其實一直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也是重要的研究旨趣。Raadschelders (1999) 便認為，「治理是公共行政固有的功能，故理解該過程則是公共行政存在的價值，而掌握政府與治理的概念，便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Fukuyama (2013) 也指出，「不論是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國家，治理是指涉政府制定與執行法規並提供服務的能力」，並強調「政府是履行國家功能的組織，而治理則是功能執行的部分，屬於公共行政的專業領域」。是以，治理與公共行政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而公共行政的核心課題，便是研究治理的過程與結果，以實現良善治理的目標。

具體而言，治理概念的若干特質（在實務與學術上），而使其能夠廣泛地被應用於公共行政研究之中。首先，符合實務運作的需求，讓治理成為當前各國普遍採用管理模式，這類的特質（Rhodes, 1996; Peters and Pierre, 1998），包括 1. 對於網絡（networks）力量的重視：在治理的概念之下，網絡已經漸漸取代國家而成為公共政策主導的力量，雖然國家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與進行關鍵的決定。然而，實際的行動大多仍交由其他部門來執行（Rhodes, 1996; Peters and Pierre, 1998; Bevir, 2011a）；2. 從直接控制轉變為間接影響：在治理的結構之中，所有行動者持續著交換資源、協商目標，形成互相依賴的關係，因此，權力來源並非單一而是多元且割裂的，也就是說國家並非全然無能為力，而是失去直接控制的能力，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仍然可以使用影響力，透過議價來達成目標（Rhodes, 1996; Peters and Pierre, 1998; Bevir, 2011a）；3. 促進公私資源的結合：在治理的過程之中，網絡的形成將有助於行動者資源的整合，有助於國家與其他部門資源的結合（Rhodes, 1996; Peters and Pierre, 1998; Bevir, 2011a），而最常見的形式就是建立或多或少的夥伴關係（Peters and Pierre, 1998），這種夥伴關係的建立植基於雙方的信任、認同的規則，而進行著

賽局式 (game-like) 的互動 (Rhodes, 1996)；4. 發展多元工具的應用：由於網絡結構與夥伴關係的形成，意味者國家願意在傳統的政策工具之外，發展出新的治理工具，將權力交由其他部門行使，讓各類型非國家行動者都能參與服務提供的過程，給予這些行動者高度的自主權 (Rhodes, 1996; Peters and Pierre, 1998; Bevir, 2011a)。

其次，若干學術研究上的特質，也促成治理成為當代學者廣為使用的概念 (Pollitt and Hupe, 2011)，包括：1. 高度的抽象性：具備多元、重疊 (有時甚是衝突的) 的定義 (Pollitt and Hupe, 2011)，能夠涵蓋多元的面向與意涵，可以是指涉一種統治過程、統治結構、統治方法或分析架構 (Rhodes, 1996; Pollitt and Hupe, 2011; 孫本初, 2013)，同時，又能與其他概念連結而極富彈性 (Pollitt and Hupe, 2011)；2. 強烈的規範性 (normative charge)，具有積極的正面意涵，而難以反對，部分來自於使用「現代」、「進步」的標籤，以取代目前「過時的」概念 (Pollitt and Hupe, 2011)；3. 化解先前困境與二元對立的能力：有助於降低、隱藏及迴避傳統社會科學所關注之利益與邏輯上的衝突 (Pollitt and Hupe, 2011)；4. 跨界的流動性：被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廣為知曉與應用 (Pollitt and Hupe, 2011)，因此，成為時髦 (fashion) 的代名詞。申言之，由於治理概念具備以上的特質，尤其在實務與學術兩股力量的推波助瀾、相輔相成之下，造就治理概念成為當代無所不在的現象 (Bever, 2011a)，甚至使其成為跨越領域、跨越學科分界的熱門理論之一 (Bever, 2011a; Pollitt and Hupe, 2011)。

總的來說，治理雖已被各界廣泛的使用，但，至今治理概念仍然欠缺一個清楚、完整的定義 (Rhodes, 1996; Peters and Pierre, 1998)，而產生各說各話、莫衷一是的情況 (Bever, 2011a)。然而，換個角度思考，或許正是因為治理概念的模糊特質，才能造就其理論內涵具備的高度包容性與彈性，成為跨領域、跨學科的新寵兒，使得治理概念十分適合作為探討跨領域智識流動的起點²。

² 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之目的並非在於界定治理概念的定義，或釐清治理與相似概念的差異，且在既有文獻已對上述議題進行大量的討論之下，如讀者對於治理概念的界定及相似概念釐清等主題產生興趣，建議可以自先參考 Bevir (2011b) 與 Levi-Faur (2012) 主編的著作，書中對於治理概念的介紹較具完整及系統性，而以治理為主題的期刊論文亦有助讀者對於上述議題的瞭解。

二、知識轉移在智識流動的發展過程

Findlay (1978) 是首先提出「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 理論的學者，嘗試從個人、團體及組織等不同層次，分別解釋知識的流動的定義與概念 (Argote and Ingram, 2000; Inkpen and Dinur, 1998)。在知識流動的場域中，行動者可以扮演「接收者」(taker)、「給予者」(giver) 與「互動者」(interactor) 等不同角色 (Findlay, 1978)。首先，知識接收者當因應策略產生變動時，便有尋求新的資源之需求 (Zack, 1999)；而知識提供者則是在應用知識的範疇 (knowledge domain) 與知識衍生的產品領域 (product domain) 中，提供動態的知識內涵。而兩者並非具有一致性 (Grant, 1996)，但藉由知識轉移則能創造其價值。而本研究所重視的是行動者在知識場域中的互動關係，如何在「治理議題」下，進行跨學術領域的知識轉移。誠如 Szulanski (1996) 所提出的論點，知識提供者與接收者間，將知識進行交換。知識內涵、提供者、接收者的背景屬性與互動皆可能是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 (Verkasalo and Lappalainen, 1998)。然而，知識的轉移，甚至智識的轉移，僅依靠行動者的互動即可完成嗎？Argote 與 Ingram (2000) 認為，知識轉移必須透過具有經驗之組織（個人與團體），將經驗傳授至他者 (alters) 的過程達成。尤其知識轉移的過程中，社會化 (socialization) 的因素是知識轉化為內隱知識的程序，藉由經驗分享來創造對於知識的認知、理解、應用，最後內化的連續過程 (Gilbert and Gordey-Hayes, 1996)。

從廣告的跨界學習研究中，學者提出知識的轉移是一種「默示」(tacit) 的內涵 (何中馨, 2007)。知識的擴散表現在空間範圍中，知識的學習便是發生在特定的場域中，難以跨越空間的界線而遠距離傳遞 (Morgan, 2004; Storper and Venables, 2004)。以學術觀點的角度說，從政治跨足到公共行政的空間，在觀念、理論與應用上來說，皆是不容易跨越的領域。從創新的視角說，在地理空間上的「地理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 更是強調事務的「在地化」(localization)，知識的接近性也形成外溢與學習的效果。然而，跨越地理上的邊界有相當的困難度，因此在企業領域的知識學習上，便藉由「組織接近性」概念來說明「地理鄰近性」的現象。此外，透過跨域學習而建立的「知識渠道」，可維持互動的頻率與品質

(Bathelt, Malmberg, and Maskell, 2004; 何中馨, 2007)。在制度化的知識轉移過程中，表現出另一種在社群中的「權力關係」，從中進行溝通、協商，及跨領域學習的過程 (Morgan, 2001)。

何中馨 (2007) 引用 Allen (1977) 對知識轉移的解釋，認為其代表的權力呈現可以從「集中性」、「網絡」與「圖像」等面向進行概念的談論，且知識的轉移代表著行動者全力跨越不同的空間。以何中馨廣告學習經驗的知識傳遞案例來說，跨界的關係網絡也是重要的因素。綿密的組織網絡，會共同分享資源。而蔡敦浩、李慶芳、藍紫堂 (2004) 也在知識轉移的模式中，提出知識的「程序面」應涵蓋「創造」、「儲存」、「轉移」與「應用」等四個層次。其研究結果發現，當知識轉移的策略面以「人」為基礎視為一個分析單位時，在「執行面」就會側重「創造」與「應用」，最後可以達到「分享」的結果。

綜上所述，知識的轉移除了與行動者 (組織) 的位置鄰近性具有相關外，網絡的集中與離散同樣是影響智識轉移的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擬從網絡的觀點來分析知識轉移與分享的過程，將學者著作之間所引用的文獻網絡，作為探討知識轉移的基礎，並著重於知識轉移的「創造」與「應用」的層次，藉此探討我國「公共行政」與「非公共行政」領域之間，「治理」概念是如何被引進、應用及轉化。

三、社會網絡分析

網絡分析的應用近年來在許多研究領域被廣泛討論，包括在社會學中探討友誼網絡、管理學的企業網絡，以及在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皆是重要的研究工具，而晚近公共行政領域的學者，也嘗試說明網絡分析應用於公共政策研究的潛在性與可能性 (王光旭, 2015)。網絡中的他者 (alters) 是產生最基礎的關係或集體性的單位，也是進行社會網絡連結的行動者 (White, Boorman, and Breiger, 1976: 732)。程度中心性 (centrality degree) 立基於自身與他者在網絡的關係，意指具有聲望地位的行動者 (Moreno, 1934)，接受他者的鏈結而形塑網絡中心者的地位。在網絡互動過程中，謝儲鍵、林煥笙、陳敦源 (2016) 認為若行動者的連結相對其他行動者有明顯的互動關係，則可推測此行動者在組織團體中具有核心主導的優勢。

當然，程度中心性（centrality degree）可預測網絡重要的主導角色，同時測量行動者在網絡的核心與邊緣位置（Freeman, 1979）。簡言之，程度中心性可展現出本文在治理研究範疇中，每篇論文的作者被其他作者引用的程度。以本文例子說明，若作者被引用的中心性愈高，代表行動者或其文章在治理領域中具有代表性，在網絡中成為扮演學術影響力的角色。以下先介紹網絡程度中心性的衡量，其計算方式如下：程度中心度為點內向程度（ $d_i(n_i)$ ）和點外向程度（ $d_o(n_i)$ ）之和，若是以相對中心度作為中心性指標，其公式則為以下：

$$C_D = \frac{d_i(n_i) + d_o(n_i)}{2(N - 1)}$$

上述公式中所表示的中心度公式，是一種不受其他行動者控制的測量概念。簡言之，就是一個節點與其他節點的接近性程度。計算方式是該節點與其他所有節點的距離之和，包括向外（ $d_i(n_i)$ ）與向內（ $d_o(n_i)$ ）。而每個節點的中心度都是 $n-1$ ，在中心性的測量大多以絕對中心度進行測量，將向外跟向內程度相加再除以兩倍的中心度（ $n-1$ ）。

承接上節對於知識轉移之定義與內涵，社會網絡早在 Coleman(1988) 時期便提出知識流動的相關論點。Coleman 認為網絡對於企業而言是一種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元素，而網絡結構（中心性、結構洞、密度等概念）對知識轉移具有影響力。Burt（1992）也認為組織中能夠鏈結結構洞的行動者，便能獲得相對豐富的訊息與優勢。訊息愈多，愈有產生知識轉移的機會。因此，在本研究的網絡指標分析中，除了透過程度中心性瞭解作者在治理研究領域的貢獻度與中意性外，作者扮演連結不同領域的學者之結果，也是知識轉移重要的觀察分析要素。Granovetter（1974）在博士論文「找工作」（Getting a job）的研究結果中發現，網絡中有所謂的「弱連帶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現象。Granovetter 認為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可能隱藏著「弱連結」特徵，也就是兩者的連繫並非透過同質性（homogeneous）的第三者牽線，而是由一個異質性的行動者進行連結。換言之，網絡中的資源傳遞極有可能是由兩個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節點所傳達，而限制性（constraint）愈少的行動者則愈可能在網絡中製造更多「結構洞」（structural hole）的機會。

然而，網絡如同蜘蛛網般呈現多重關係，行動者可能發展連結的路徑當然也相當複雜。我們可以換個方向思考結構洞的概念，若網絡中有兩個具有高度非冗餘（non-redundancy）的行動者，也就是雙方受到他者影響牽絆較少。簡言之，若行動者在群體間與他者的連結重複性較低，則更有可能扮演連結不同行動者間之資訊資源傳遞溝通者角色。以本文為例，若作者的治理研究非特定屬於某一個專業領域，而是橫跨多領域的綜合性議題。在此情況下，其文章將有可能被不同治理次領域的作者所引用，而將治理概念擴散到其他群體中。在此基礎上，兩者間最大的資源與機會獲取的利益連結，則相對會促成結構洞³的出現（Burt, 1992）。此概念旨在說明網絡中，「兩個行動者集團之間的非重疊關係，所形成的斷裂、空洞圖像。結構洞的位置可有效掌握訊息的流通，對人際網絡中形成所謂的小團體（謝儲鍵、林煥笙、陳敦源，2016：75）」。

當網絡中行動者的結構洞特徵越明顯，代表受到其他行動者的限制愈低、越不易被阻斷連結，Granovetter（1974）認為將更能獲取多元資訊或相關利益。

以此而論，行動者有機會接觸到非冗餘關係的他者。結構洞的應用主要可測量在網絡中的橋樑關係，檢視行動者跨越群體的能力。以本文的例子而言，當作者與他者的在治理次領域的網絡重複性較低，但卻掌握重要治理議題時，則可能成為其他領域作者引用的文章。透過這樣角色的行動者，向不同領域與觀點的行動者傳遞、溝通相關治理議題的研究，達到「學術掮客」的功能。簡言之，結構洞容易存在一個凝聚力較低，兩個群體非對等的環境下，較容易出現結構洞。以下為結構洞之公式說明：當行動者 i 在 q 上投資時間， q 投資與 j 的關係，而行動者在 q 的投資最後將回到 j 身上。然而，行動者 i 若與 j 的直接投資愈多，則將有更多的限制性與冗餘， q 不易成為網絡中的掮客（broker）。因為限制度是介於 0 至 1 間，在下列公式中 q 不等於 i 和 j ， P_{ij} 是花費在 j 上的時間 / 精力，占總時間 / 精力的比例。當 j 是 i 的唯一連結節點時，整個總和取最大值 1；當 j 不通過其他節點與 j 間接相連時， q 取最小值 P_{ij} 。

³ 若兩個節點的連結可以獲取最大的機會與資源時，就愈有可能出現結構洞的情況。例如：兩個原本立場與社交圈不一致的行動者，若能有效溝通，進行合作，可能會產生極大的效益。

$$P_{ij} + \sum_q P_{iq}P_{qj}, q \neq i, j$$

綜上所述，本文欲對於治理研究中行動者之知識轉移，在公共行政與其他學術領域的流動現象與發展進行探討。其研究之分析要素包含：(一) 程度中心性作為測量網絡行動者誰掌握資訊的來源，可判別行動者在網絡中受他人重視的程度；(二) 結構洞透過結構限制度，來找出網絡中最可能成為連結兩個異質性群體的角色（參見下表 1）。

表 1 網絡分析要素

網絡測量指標	指標定義
程度中心性	中心性可用來測量行動者在網絡中的聲望與重要性，行動者與他者的連結越多，代表在網絡中具有高度重要性（被需要性）。中心性可表示正向與負向的意涵，若是正向性的高中心性者，將會獲取及控制資訊與資源。以 0 至 1 區間表示，數值越大行動者越可能具有高度中心性。以本研究為例，中心性愈高的作者，代表在治理研究中被引用的機會愈多。換言之，其所著作的相關文獻，受到其他作者的重視而加以引用。
結構洞	結構洞概念源於弱連帶的概念，存在於兩個非冗餘（non-redundancy）行動者之間，連結兩個不同群體間可能的資源與機會。扮演掮客角色的行動者，具備良好的橋樑功能，有效地傳遞資訊。在知識轉移的過程中，行動者著作被他者引用的過程，傳遞知識進而造成流動的可能性，形成知識轉移的結果。以本研究為例，愈有潛力成為網絡結構洞的行動者，愈可能連結兩個（多個）群體，達到資訊傳遞的功能。而扮演此功能的作者，則可能因自己的研究著作受到不同領域的他者引用，而將治理概念帶至其他學術研究場域，進行跨領域對話。

資料來源：修改自謝儲鍵、陳敦源（2016：18-19）。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藉由實際資料的佐證，描繪治理概念在公共行政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擴散與連結，並說明公共行政在此一智識網絡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研究所選用的資料來源及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資料來源

期刊文獻是瞭解學術社群智識累積的最具體與最重要管道，因此，探討學科發展的研究大多將期刊文獻當作重要的分析對象之一（孫同文，1998；施能傑，2013；詹中原，2013），而分析跨學科、跨領域知識網絡的相關研究也是如此（陳世榮，2007；袁大鈺、唐牧群，2010；柯佩均、熊瑞梅、盧科位，2012）。由於國內學術性期刊多半都有審查機制，而且頗具引領作用，故本研究選擇期刊文獻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

表 2 政治學學門之各年度 TSSCI 收錄期刊（*為本研究所選定之期刊）

領域別	期刊名稱 / 年度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1	12	13	14	15	16
政治學學門	中國大陸研究	●	●		○											
	東吳政治學報*	●	○	○	●	●	●	●	●	●	●	●	●	●	●	●
	問題與研究 (季刊)	●	●	○	●	●	●	●	●	●	●	●	●	●	●	●
	選舉研究	●	●	○	○	●	●	●	●	●	●	●	●	●	●	●
	公共行政學報*			○	○	●	●	●	●	●	●	●	●	●	●	●
	臺灣政治學刊*	○	○	○	○	●	●	●	●	●	●	●	●	●	●	●
	政治科學論叢*	●	○	●	○	●	●	●	●	●	●	●	●	●	●	●
	政治與社會哲學 評論*					●	●	●	●	●	●	●	●	●	●	●
	政治學報*		○	○	○	●	●	●	●	●	●	●	●	●	●	●
	遠景基金會季刊				○	●	●	●	●	●	●	●	●	●	●	●
	行政暨政策學報*							●	●	●	●	●	●	●	●	●
	臺灣民主季刊								●	●	●	●	●	●	●	●
	中國行政評論	○	○	○												
		上述 7 本所選定的期刊中，共有 71 篇符合搜尋標準的論文														

註：自 2005 年起取消「正式名單」（表中●）與「觀察名單」（表中○）的區別，通過審查之期刊皆列入「TSSCI 期刊收錄名單」。另外，自 2016 年起，依據「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實施方案執行評比新制，將通過評比期刊分為三級，政治學屬於 2017 年的評比學門，在新制評比結果公布之前沿用 2015 年之評比結果。

資料來源：整理自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67>，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為避免資料蒐集範圍過大，而無法聚焦，所以，在期刊與論文的屬性部分必須先進行挑選。在期刊選擇的部分，經過成員討論之後，挑選期刊名稱中有「政治」或「行政」的期刊為分析標的，有助於瞭解公共行政與其理論母學之間的知識連結，並輔以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簡稱 TSSCI) 作為期刊的選擇標準 (收錄五年以上), 本研究主要考量是這類型的期刊通常學術的影響力較大, 而最終選定的期刊清單, 請參見表 2 內容; 而在論文的篩選部分, 經過成員討論之後, 選定「治理」一詞作為搜尋的標準, 並將「篇名」與「關鍵字」設定為判斷的欄位。最後, 共有 71 篇符合前述搜尋標準的論文, 而所選定期刊之各年度的論文數量統計, 請參見後續表 4 內容。

二、分析方法與資料結構

本研究在分析方法的選擇上, 以描述性統計與社會網絡分析為主, 相關資料分析的設計及說明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與統計檢定

透過描述性統計與統計檢定, 有助於呈現治理研究及其作者的相關資訊, 包括各年度的論文篇數、各期刊的論文篇數、作者數目、作者領域別、公行貢獻度以及相關變數的交叉分析。必須強調的是,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基本上是以個別論文為基礎, 而非以個別作者。然而, 無論是作者或是被引用者, 如果該篇論文是由多位學者一起合寫, 這些學者仍將被視為是一體。因此, 作者領域是以「該篇論文中, 所有作者之所屬單位 (機構或科系)」為判斷的基礎⁴, 並按照不同的情況劃分為純公行領域、非公行領域及跨領域 (即公行加上非公行) 三大類型, 相關單位的之分類請參照附錄表 A 與表 B; 而公行貢獻度則是以「該篇論文中, 所有任職於公行領域機構或科系之作者論文貢獻度的加總」, 其值介於 1~0 之間, 而由於第一

⁴ 大抵而言, 研究者可藉由「學歷」或「系所」兩種不同的判斷標準, 作為劃分論文作者領域之依據。前者, 主要聚焦於論文作者學歷層面的差異, 如畢業科系、最高學歷等; 後者, 則是關注論文作者任職單位的差異。在兩種判斷標準均有所限制的情況之下, 本研究便採取相對客觀的判斷途徑, 即使用任職單位作為判斷領域歸屬之依據, 因為對於任職或任教於特定學科的對象而言, 其教學或研究都必須與該特定學科有關, 才能符合該單位之目的與要求, 而其學科背景在某種程度上, 僅是該對象進行研究或教學的工具或依據。但, 後續研究如欲克服因單一測量所產生的相關爭議, 本研究建議可以嘗試 1. 結合任職單位與最高學歷兩項作者的屬性, 作為衡量作者領域歸屬的指標, 也就是同時將「學歷」及「系所」納入指標; 亦可 2. 輔以問卷調查, 直接詢問論文作者的意見, 即同時將「主觀」及「客觀」納入指標。

作者通常對於論文的貢獻度相對較高，因此在公式中賦予其較多的權值，相關的計算公式如下⁵：

$$x = a * 1$$

$$y = y_1 + \sum y_n, \quad y_1 = a * \frac{2}{(n+1)}, \quad y_n = a * \frac{1}{(n+1)}$$

x =單一作者論文的公行貢獻度

y =兩位以上作者論文的公行貢獻度，其中， y_1 是第一位作者貢獻的計算公式； y_n 是其餘作者貢獻的計算公式

a =作者是否為公行領域（公行領域=1；非公行領域=0）

n =作者數目

舉例言之，假設論文由四位作者共同著作，其中，第一位與第四位作者任教職於公行領域。根據上述的計算公式，須採取 y 的公式來計算論文的公行貢獻度，第一作者貢獻度為 $2/5$ ，第四位作者貢獻度 $1/5$ ，所以論文的公行貢獻總合為 0.6 ，依此類推。

此外，在變數的交叉分析的部分，則是按照變數的測量尺度（scale of measure），選擇適合的方法進行統計檢定，如費雪精確檢定（Fisher's exact test）或 ANOVA（Analysis of Variance）等，以瞭解變數之間的關聯。

（二）社會網絡分析

本研究依照政治學門專業期刊排序資料庫提供的數據資料，建構專業期刊引用矩陣。引用資料是 2000 年至 2017 年 6 月政治學門專業期刊

⁵ 關於論文作者順序與其貢獻度的關聯，除非由是作者們自行評估與說明，否則在一般情況之下，外人十分難以得知真實的情形。是以，從客觀的角度來觀察，在一般的情況之下，作者順序較前面，代表其貢獻度相對較高，成為絕大部分論文著作審查所採用的邏輯，如教師聘用、教師升等或教學評鑑等審查。延續前述的邏輯，為了有效地凸顯第一作者的角色，本研究參考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的博士班修業辦法，賦予第一作者貢獻度兩倍的權值。然，不可諱言的，在某些情況之下，作者順序的決策過程有可能更為複雜。本研究相信一篇論文之所以能夠完成，主要是作者們齊心協力的結果，而作者順位在某種程度上，僅是代表彼此貢獻比重的差距，即便是彼此的貢獻一樣或差距很小，在論文發表時仍須設定順序。準此，本研究採取上述策略之用意，並非欲抹殺其他順位作者的努力與貢獻，而是為能貼近研究旨趣與發展客觀指標，並考量實際可蒐集的客觀依據後，所採取的折衷策略。

(TSSCI, 共七種)的專業論文。其中,矩陣建構是以學術論文逐一進行文獻引用的統計,計算論文中:1. 每篇期刊作者引用每一篇參考文獻的作者;2. 期刊論文作者與引用文獻之治理次領域,然後轉置為網絡矩陣。表3引用網絡的範例,是一個由1與0(1代表有連結、0代表無連結)組成的有向圖矩陣(Wasserman and Faust, 1994),從列指向行表示一個連結(tie)的存在,雙箭頭意指兩個行動者彼此互相引用。下表為一個單模(one-mode)矩陣的示範,表中可看到「A」作者引用「AD」作者之文獻,「AD」作者也引用「A」作者之文獻;單箭頭則代表僅有一方引用,如「C」作者引用「B」作者之文獻,但「B」作者無引用「C」作者之文獻。另一種情況則是E作者,其參考文獻並沒有引用任何中文期刊作者。此外,若是一篇文章有兩位作者以上,本研究仍視為單一作者(例如:AB),以表3範例而言,AB引用了A、B,及AD等作者之文章(如表3)。

表3 作者引用參考文獻作者之行動者矩陣(範例)

作者 / 引用作者	A	B	C	AD
A	0	1	0	1
B	0	1	0	0
C	0	1	1	0
D	1	0	0	1
E	0	0	0	0
AB	1	1	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欲探討作者在「治理」,所論著的文章中引用其他篇文章作者的情況,以及作者所關注的次領域議題。就每篇文章中作者在治理次領域的連結性,以此作為探討治理概念在公共行政與非公共行政的智識流動情況。本研究透過以下幾個步驟來進行治理相關的論文中作者與次領域的網絡分析:

1. 首先,本研究就臺灣政治學學門中之七本 TSSCI 期刊,作為本文篩選治理論文的主要來源。從 2000 年至 2017 年 6 月,共蒐集 71 篇關於治理的相關論文。
2. 關於社會網絡登錄步驟,皆是以「論文」作為網絡單位。在行動者(作

者)的引用部分，主要依據每篇論文後面的參考文獻(只擷取中文的期刊論文、專書或專章等屬性學術論文)的作者。而對於作者引用治理次領域網絡的領域，也是以每篇論文作為一個網絡單位。將作者研究的治理次領域，與所引用的參考文獻中，符合上述參考文獻的內容次領域進行登錄。

3. 依據上述欲登錄的網絡圖，依照不同時間點，每五年為一個單位進行分段，加上整體的網絡，共有四個分析區間(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7年以及2000-2017年等)。每個分析區間皆以行動者為「論文」最後解釋的主體，例如：在「環境治理」領域中，A與C行動者因透過此環境治理議題而彼此連結。
4. 記錄完成後，將登錄的Excel表格轉換成為社會網絡分析軟體UCInet網絡模型，對網絡角色之互動關係進行網絡分析。以中心者與結構洞等面向進行網絡分析，從行動者在網絡中的路徑瞭解治理之智識流動的中心者與捐客角色分布。

肆、資料分析

依照分析方法的差異，本研究將資料分析的內容，大致劃分為描述性統計與社會網絡分析兩大主題，並嘗試回答相關的研究問題，分析的結果呈現如下：

一、各年度論文之分布概況

藉由呈現不同期刊歷年所刊登之治理論文篇數，將有助於說明治理研究在行政與非行政領域的發展概況。從表4可知，若依據年度來觀察，可以發現在2001到2004年之間，只有5篇以治理概念為主題的研究，出現在政治學學門的TSSCI期刊當中，而從2005年開始才有大量的治理研究出現，其中，2005年(10篇)、2006年(9篇)、2008年(10篇)及2011

年（11 篇）都是治理研究發表的高峰期；此外，若依據期刊來觀察，則可以發現「公共行政學報」（29 篇）歷年所刊登的治理研究最多，接著是「政治科學論叢」（11 篇）與「行政暨政策學報」（9 篇）；反之，「政治學報」（3）篇、「臺灣政治學刊」（4 篇）與「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 篇）則是相對較少。

整體來說，表 4 的數據便代表著治理研究在行政與非行政領域的發展歷程，相較而言，治理議題在行政領域的相關期刊中較受重視，其中，「公共行政學報」自 2004 年到 2012 年的論文都有出現治理研究（28/29 篇），在 2008 年所刊登的治理研究甚至高達 10 篇，遠遠超過其他期刊；而「行政暨政策學報」從 2010 年到 2013 年也都有持續刊登治理研究（7/9 篇）。從此可知，這兩份典型的公共行政研究學術期刊（施能傑，2013：238），對於治理的相關研究接受程度相當的高，同時，某種程度亦顯示出研究者對於治理概念的重視與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學報」（2004 年）與「行政暨政策學報」（2006 年）並不是最早刊登治理研究的期刊，而是「臺灣政治學刊」（2001 年）與「政治科學論叢」（2002 年），這樣的結果究竟是作者或期刊有意的選擇，或者是雙方無意的巧合則需要更多的資料來證明，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自 2012 年之後，治理研究出現的比例漸趨和緩，也就說，篇名或關鍵字採用治理一詞的論文數量大幅降低。

表 4 各期刊於不同年度之治理論文篇數

期刊 / 年度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總和
臺灣政治學刊	1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4
政治學報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3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1	0	1	1	0	6
政治科學論叢	0	1	1	0	3	0	1	0	1	0	2	1	0	1	0	0	0	11
東吳政治學報	0	0	0	0	1	1	0	0	1	1	1	0	0	0	3	1	0	9
行政暨政策學報	0	0	0	0	0	2	0	0	0	2	1	1	3	0	0	0	0	9
公共行政學報	0	0	0	2	5	4	1	10	2	1	2	1	0	0	1	0	0	29
總和	1	1	1	2	10	9	3	10	5	4	10	3	4	1	5	2	0	7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論文及其作者之基本屬性

表 5 內容進一步檢視前述治理研究及其作者的相關屬性，並依據論文

被刊登的時間加以比較，所納入分析的屬性包括篇數、期刊別、作者數、作者領域別及公行貢獻度等。為避免分析結果過於瑣碎，本研究將時間依序劃分為 2001-2005 年、2006-2010 年及 2011-2017 年等三個區間來進行比較⁶。

在篇數的部分，以 2006-2010 年的篇數最多（43.7%），2011-2017 年其次（35.2%），2001-2005 年（21.1%）最少（請參見表 5）。在期刊別的部分，則是沒有明顯的趨勢，各時期都有不同變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1-2017 年各個期刊都有刊登治理的論文，而費雪精確檢定的結果則顯示，各期刊治理研究的刊登數量在不同時期有顯著的差異（請參見表 5），關於各年度的分布細節請參見前表 5 內容。

在作者人數部分，從表 5 得知，治理研究的作者大多為單一作者（70.4%），兩位（21.1%）與三位（8.5%）作者相對較少，其中，單一作者以 2006-2010 年的比例最高（52.0%），兩位與三位作者均以 2011-2017 年的比例最高（66.7%；66.7%），而費雪精確檢定的結果則顯示，論文的作者數量在不同時期有顯著的差異（請參見表 5）。若進一步考量到期刊的差異時（請參見表 6），以治理論文數量前三高的期刊來觀察，仍然是單一作者的比例較高，其中，「公共行政學報」在 2006-2010 年（16/29）單一作者占自身所有治理研究的比例最高，「政治科學論叢」則是在 2001-2005 年（4/11）的比例最高，而「東吳政治學報」與「行政暨政策學報」同樣是在 2011-2017 年（3/9；3/9）的比例最高。

在作者領域別的部分，依據表 5 內容，以非公行領域的比例最高（53.5%），公行領域其次（40.8%），公行與非公行合作的比例則是偏低（5.6%），其中，非公行領域的作者的分布相對平均，公行領域的作者以 2006-2010 年的比例最高（51.7%），公行與非公行合作的作者以 2011-2017 年的比例最高（50.0%），而費雪精確檢定的結果則顯示，論文的作者領

⁶ 將整體資料切割為不同的時間點進行觀察，將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描繪出分析資料的動態變化，尤其是對於探討特定事物發展的研究而言，掌握資料的動態變化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然，過長或過短的分割時間，都不是好的選擇。由於本研究聚焦的議題是治理概念的擴散與連結，故在此一前提之下，過短的時間劃分並不適合用於檢視學術理論發展，因此，本研究參考 Doreian 與 Fararo（1985）針對學術期刊的研究設計，嘗試以每 5 年當作一個分析區間，用以說明我國治理研究分布與其智識網絡的變化。惟 2017 年只有蒐集半年的資料，故納入 2011-2016 的區間之中。

域別在不同時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請參見表 5）。若進一步考量到期刊的差異時（請參見表 7），卻可以發現明顯的差別，特別是在典型公行期刊與政治期刊的比較結果，前者主要以公行領域的作者為主，後者則是以非公行領域的，同樣以治理論文數量前三高的期刊來觀察，「公共行政學報」在 2006-2010 年（11/29）與「行政暨政策學報」在 2011-2017 年（4/9）公行作者占自身所有治理研究的比例最高，而「政治科學論叢」在 2001-2005 年（5/11）與「東吳政治學報」在 2001-2005 年（3/9）則是非公行作者占自身所有治理研究的比例最高。

最後，在公行貢獻度的部分，整體貢獻度為 0.44，而各階段的貢獻度比例差異不大，其中，以 2006-2010 年的平均貢獻度最高（0.51），2001-2005 年其次（0.44），2011-2016 年最少（0.37），而 ANOVA 檢定的結果則顯示，平均公行貢獻度在不同時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請參見表 5）。若進一步考量到期刊的差異時（請參見表 8），卻可以發現明顯的不同，由於受到作者領域分布的影響，不意外地，結果是「公共行政學報」與「行政暨政策學報」的平均公行貢獻度較高，不過，值得關注的是，「行政暨政策學報」（0.85）的平均公行貢獻度則是高於治理研究篇數最多的「公共行政學報」（0.70）。此外，考量到 70.4% 的治理研究都是單一作者（請參見表 5），如能對照論文第一作者的領域分布，將有助於辨識形成上述結果的相關成因。準此，表 8 右半部則是提供關於第一作者在公行領域的比例，結果顯示「行政暨政策學報」除了 2001-2005 年沒有收錄治理研究的論文之外，在 2006-2010 年（100%）與在 2011-2017 年（80.0%）第一作者在公行領域的比例都在 80% 以上，而「公共行政學報」在 2001-2005 年第一作者在公行領域的雖然高達 100%，但是，在 2006-2010 年第一作者在公行領域的卻降到 61.1%，而 2011-2017 年的平均公行貢獻度也只有 75.0%。換句話說，在探討對於特定研究議題的貢獻程度時，在受到單一作者比例偏高的前提之下，第一作者的領域別可能會影響著各自領域對於特定研究議題的貢獻度。

表 5 論文及作者的基本屬性分布（直%）

年份	篇數	期刊別**							作者數**			領域別			公行貢獻度
		A	B	C	D	E	F	G	1	2	3	純公行	跨領域	非公行	
整體#	71	4	3	6	11	9	9	29	50	15	6	29	4	38	0.44
整體(橫%)	100%	5.6%	4.2%	8.5%	15.5%	12.7%	12.7%	40.8%	70.4%	21.1%	8.5%	40.8%	5.6%	53.5%	N/A
01-05	21.1%	50.0%	N/A	N/A	45.5%	11.1%	N/A	24.1%	26.0%	6.7%	16.7%	20.7%	25.0%	21.1%	0.44
06-10	43.7%	25.0%	N/A	50.0%	18.2%	33.3%	44.4%	62.1%	52.0%	26.7%	16.7%	51.7%	25.0%	39.5%	0.51
11-17	35.2%	25.0%	100.0%	50.0%	36.4%	55.6%	55.6%	13.8%	22.0%	66.7%	66.7%	27.6%	50.0%	39.5%	0.37
檢定	N/A	P 值 0.008							P 值 0.007			P 值 0.731			F 值 0.55 P 值 0.58

註 1：表格中期刊名按照筆畫由多至少進行排序，其代碼依序為臺灣政治學刊（A）、政治學報（B）、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C）、政治科學論叢（D）、東吳政治學報（E）、行政暨政策學報（F）、公共行政學報（G）。後續表格（表 5~表 8 及表 14）中代碼亦同。

註 2：表格中百分比為直%。*** P < .001；** P < .01；*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6 作者數在不同期刊別與年份的變動情況

年份	A			B			C			D			E			F			G		
	1位	2位	3位	1位	2位	3位	1位	2位	3位	1位	2位	3位	1位	2位	3位	1位	2位	3位	1位	2位	3位
整體#	3	1	0	1	1	1	4	2	0	8	1	2	6	3	0	5	3	1	23	4	2
01-05	2	0	0	N/A	N/A	N/A	N/A	N/A	N/A	4	0	1	1	0	0	N/A	N/A	N/A	6	1	0
06-10	1	0	0	N/A	N/A	N/A	3	0	0	2	0	0	2	1	0	2	2	0	16	1	1
11-17	0	1	0	1	1	1	1	2	0	2	1	1	3	2	0	3	1	1	1	2	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7 作者領域在不同期刊別與年份的變動情況

年份	A			B			C			D			E			F			G		
	公行	綜合	非公	公行	綜合	非公	公行	綜合	非公	公行	綜合	非公	公行	綜合	非公	公行	綜合	非公	公行	綜合	非公
整體#	0	0	4	0	0	3	0	0	6	1	0	10	2	1	6	7	1	1	19	2	8
01-05	0	0	2	N/A	N/A	N/A	N/A	N/A	N/A	0	0	5	0	0	1	N/A	N/A	N/A	6	1	0
06-10	0	0	1	N/A	N/A	N/A	0	0	3	0	0	2	1	0	2	3	1	0	11	0	7
11-17	0	0	1	0	0	3	0	0	3	1	0	3	1	1	3	4	0	1	2	1	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8 公行作者貢獻在不同期刊別與年份的變動情況

年份	公行作者貢獻度（平均數）							第一作者為公行領域（%）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整體	0.00	0.00	0.00	.09	.30	.85	.70	(0/4)	(0/3)	(0/6)	(1/11)	(3/9)	(8/9)	(21/29)
01-05	0.00	N/A	N/A	0.00	0.00	N/A	.95	0.0%	N/A	N/A	0.0%	0.0%	N/A	100.0%
06-10	0.00	N/A	0.00	0.00	.33	.92	.61	0.0%	N/A	0.0%	0.0%	33.3%	100.0%	61.1%
11-17	0.00	0.00	0.00	.25	.33	.80	.63	0.0%	0.0%	0.0%	25.0%	40.0%	80.0%	75.0%

註：在右半部的表格中，()中數值為第一作者所屬於公行領域占所有治理研究的比例，而百分比為第一作者任教於公行領域占所有第一作者的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社會網絡分析

(一) 論文作者引用參考文獻作者之網絡

對於學術研究中知識的流動，「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學術期刊的引用，「行動者」(actor) 代表著「作者」。首先，本文以「P」代表「公共行政學者」，以「O」代表「非公共行政學者」。每篇論文皆以此種形式呈現作者，因此可看到三種作者的組合，包括「純公共行政學者」、「非公共行政學者」與「混合型學者」。在前述背景分析中，2001-2005 年治理研究文獻大多出現於政治類別期刊。從背景資料分析，發現此階段除了由政治學者首先引進治理概念，同時也觀察到公共行政學者發表不少治理文章。此後各個階段，則發現不同領域的學者開始以其本身之專業知識，與治理理論研究進行對話。在網絡分析中，也以每五年為一個治理階段進行作者－作者間的引用網絡分析，結果發現，「P49」橫跨兩個年段（2001-2005、2006-2010），並在整體治理網絡中位居最重要的位置。P49 是首批研究「治理」的學者，關注地方政府議題，並持續關注與產出相關研究的公行學者。「P41」、「O54」、「P36」皆是 2001-2005 年最早一批進行治理研究的學者，對於治理發展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扮演相當重要的中心者。

換言之，這些學者之相關的治理研究，對之後的學者具有重要的領導作用，且這些學者以公共行政領域為多，代表其扮演著重要中心性角色。然而，公共行政學者引領治理研究，並非一開始便是如此。從 2001-2005 年的中心性網絡中可以看到，「O49」為國際關係，以及「O63」為政治領域的學者，佔據中心性網絡前兩位，與其他三位公共行政學者共同成為第一階段臺灣重要的治理學者。O49 與 O63 的治理文獻被其他學者引用程度高，成為 2001-2005 年治理概念引進臺灣學術界的重要推手，促使相關學者瞭解何謂治理研究。同時，O63 儘管在 2006-2010 與 2011-2017 年沒有出現在中心者網絡中，但從 2001-2017 年的整體分析中，仍可看到其佔據第二名的位置，顯示 O63 對整個治理研究仍有一定的重要性。

到了第二階段（2006-2010 年），政治學者較少佔據中心者的網絡。相對地，公共行政作者在此階段發表許多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

治理研究中。此現象可解釋為政治學者帶入治理概念後，公共行政學者也對於治理議題感到興趣，並嘗試應用於公共政策議題上。2011-2017年，大致也呈現出以公共行政學者與非公共行政學者同時扮演網絡中心者的情況。此外，治理研究的學者中，有公共行政學者與其他跨領域學者參與其中，並多以公共行政學者作為第一作者。此外，有個有趣的現象出現在2001-2005年，研究治理的公共行政學者大多以單一作者完成論文的撰寫，並扮演網絡中心者。到了2011-2017年，分析發現許多中心者轉變為兩個作者一起扮演核心角色。這代表有愈來愈多的公共行政學者，投身於治理研究領域。從政治學者在2001年將治理研究帶入臺灣學術界後，公共行政學者應用於政策制定與議題的討論。背景分析中指出，2001-2005年主要以政治學者為主，在2006-2010年則是公共行政學者最多的年代。

在網絡中心性分析中，也清楚看出佔據前五位的學者大多是公共行政的學者。而2011-2017則是公共行政與非公共行政兩個群體交流較為頻繁的年代，在中心性分析中也觀察到有「非公共行政」的學者扮演中心者角色，但其餘中心者仍是以公共行政學者為主。表4中說明，「臺灣政治學期刊」與「政治科學論叢」係最早出現「治理」概念的期刊，皆為政治學類的學術刊物。而2004年與2006年才分別在「公共行政學報」與「行政暨政策學報」，也符合網絡中心者分析結果，從非公共行政領域（例如：政治學者）轉移到公共行政領域的趨勢。

再從被引用學者的背景探討，2001-2005年所探討的治理議題集中於「全球治理」、「地方治理」、「民主治理」與「治理理論」等次領域，這也符合當時時空背景下政治環境邁向一個較為開放，接軌全球化、地方政府角色與權力興起的背景。在2006-2010年期間，「P49」延續前一個階段中心者的角色，更上一層樓成為中心性的領導者（leader），此時研究主題除了在「全球治理」與「地方治理」的議題繼續保留外，「跨域治理」也成為研究者重要的探討面向。而在2010-2017年間，治理的議題從地方、全球與民主治理，轉變成為「電子治理」與「環境治理」，而「地方治理」與「跨域治理」仍是治理研究中重要的主題。在2006-2017年約十年的期間，佔據治理研究中心的學者大多以公共行政領域的學者為主。2006-2010年是公共行政學者研究治理議題最重要的時期，到了2011-2017年則是不

同領域學者彼此交流的階段，O33 主要以環境治理議題佔據中心者的重要位置，除了自己單一發表外，O33 也與跨領域的學者進行合作。綜上可知，2001-2017 年，整體的「治理」研究係從「政治」（萌芽階段）至「公共行政」（茁壯階段），進而再延伸至「跨領域」（成熟階段），進而呈現出在智識上的轉移效應。

表 9 網絡中心性分析（作者引用文獻作者）

程度中心性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7	2001-2017
1	O63 (全球治理) (0.120)	P49 (全球治理) (0.068)	P12P13 (地方財政治理) (0.018)	P49 (第三部門治理) (0.038)
2	O49 (治理理論) (0.080)	P7 (社區治理) (0.045)	P27P22 (電子治理) (0.018)	O63 (全球治理) (0.038)
3	P36 (民主治理) (0.040)	P47 (地方治理) (0.045)	O33 (環境治理) (0.018)	P41 (地方治理) (0.019)
4	P41 (地方治理) (0.040)	P45P46 (跨域治理) (0.045)	P50 (第三部門治理) (0.018)	P41P42 (地方治理) (0.019)
5	P49 (地方治理) (0.040)	P20 (跨域治理) (0.045)	P7 (跨域治理) (0.018)	P12P43、P7、P36 (網絡、政府、民主治理) (0.019)

註：P 代表公共行政學者；O 代表非公共行政學者。() 代表作者研究次領域。() 中的數字代表中心性網絡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學者之間的引用，誰是扮演資訊、概念與研究傳遞的「掮客」⁷角色呢？在表 10 中觀察到，「治理」概念剛引進學界時，作為中介掮客的行動者背景兼具「公共行政」與「非公共行政」領域，包括社會學、政治等專業皆談論治理概念之應用。有趣的是，「P7」扮演橫跨三個區段的「掮客」角色，更在位於最重要的相對位置。此代表著「P7」的相關治理研

⁷ 網絡分析中的掮客角色，主要以限制性 (constraint) 指標作為判斷行動者是否處於一個結構洞的位置，藉此評估行動者作為潛在的掮客之屬性。當數值愈小時，代表行動者所受他者的限制愈小，則愈可能連結屬性背景不同的行動者，進而扮演掮客角色。掮客角色在政治學上來說，是具有說服、協商雙方的第三者角色，應用在網絡研究中，更可以表現出一種隱性的資訊傳遞者之現象。

究，對於連結、溝通、傳遞相關治理資訊與專業知識時，具有高度重要的功能。「P7」在中心者網絡中，從 2006 年一直到 2017 年皆是重要的中心者。但在結構洞分析，卻發現 P7 同時也扮演重要的捐客角色。P7 主要的研究議題為「公私協力」與「社區治理」，本文推測其因可能在於「公私協力」的豐富研究成果，尤其在 2000 年後協力治理逐漸成為公共行政界主要的議題。而「P49」除了扮演行動者引用相關治理文獻的中心者外，在公共行政學界研究治理最蓬勃的 2006-2010 年，以及 2000-2017 年皆扮演重要的捐客角色。這代表學者除了參考「P49」的治理論文外，也藉由「P49」的參考文獻，連結到其他學者，扮演資訊傳達的功能。這現象也可解釋，「P49」所引用的中文期刊，可被學者所信任並加以引用。此外，在捐客網絡分析可以觀察到，出現在 2006-2010 年的行動者，在整體網絡中相對成為主要捐客的機會相對提高許多（P7、P12P13、P49）。這意味著治理議題在公共行政界的蓬勃發展，也間接地透過中介者功能的捐客，來影響整個智識的流動與轉移。

表 10 網絡捐客分析（作者引用文獻作者）

結構洞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7	2001-2017
1	P2 (治理) (0.000)	P7 (政府治理) (0.250)	P7 (政府治理) (0.200)	P7 (政府治理) (0.125)
2	P4P5 (公民治理) (0.333)	P12P13 (府際治理) (0.333)	O37O38O39 (城市治理) (0.250)	P12P13 (府際治理) (0.250)
3	P7 (政府治理) (0.333)	P49 (府際治理) (0.333)	O33 (風險治理) (0.333)	P49 (府際治理) (0.250)
4	O63 (全球治理) (0.482)	O6 (電子治理) (0.333)	O28 (跨域治理) (0.333)	O37O38O39 (城市治理) (0.250)
5	O13 (全球治理) (0.495)	P10、P11 (民主、跨域治理) (0.500)	P23P24 (跨域治理) (0.333)	O28、P45P46 (跨域治理) (0.333)

註：P 代表公共行政學者；O 代表非公共行政學者。() 代表作者研究次領域。() 中的數字代表結構洞網絡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從具體的網絡圖來檢驗上述分析，則在下圖 1 中可看到，治理研究網絡中以「公共行政學者」為主，同時這些行動者也具有較高的結構洞特

徵。除了「P7」、「P49」作為網絡主要的中心者角色外，網絡左下方的公共行政學者「P45P46」，也扮演了連結兩個群體的捐客功能。此外，在網絡圖中發現，行動者的屬性區隔相當明顯。「非公共行政學者」所引用文獻的作者大多以「非公共行政學者」為主，鮮少有公共行政學者的文獻被引用至其參考文獻中。而「公共行政學者」也是類似的情況，但有少數學者會與「非公共行政學者」合作，且引用文獻的範疇也不限於公共行政學者。然而，儘管領域的差異性導致學者合作的區隔。但是從文章刊登在不同領域上的現象，例如：政治學者文章刊登在公共行政類期刊上，我們仍可視為是一種知識被不同領域的專家認可之結果，並朝向知識轉移的方向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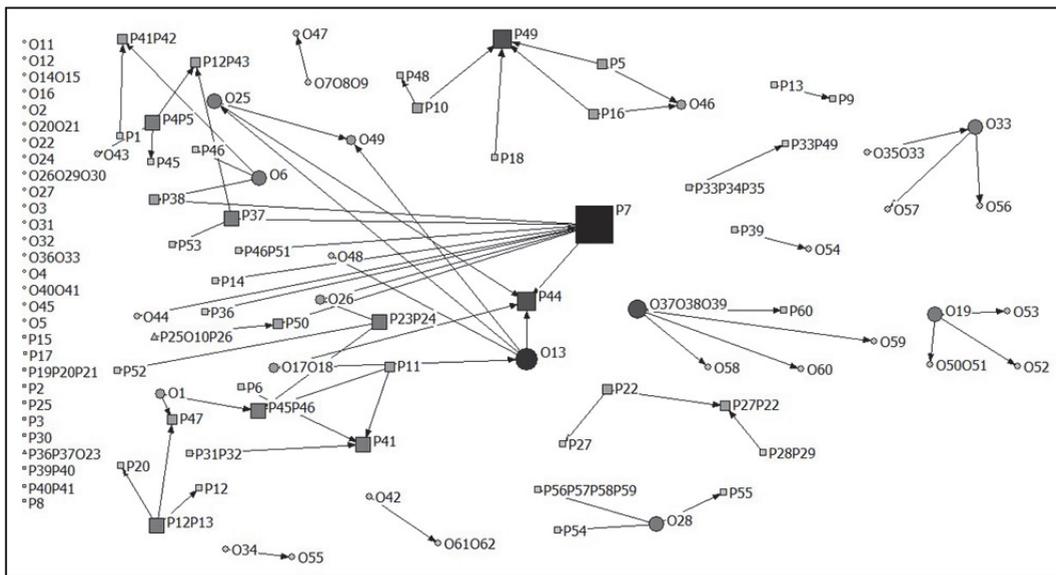


圖 1 作者引用文獻作者之網絡圖（2001-2017）

註：圖形及大小代表網絡中心性，方形為公共行政學者、圓形為非公共行政學者、三角形為混合型學者；而圖形愈大者代表中心性程度愈高；顏色深淺代表結構洞程度高低，顏色愈深者代表限制性愈低、愈可能成為網絡的捐客。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作者與治理議題次領域之網絡分析

上一個部份的分析重點，主要強調作者之間⁸（one-mode）在文獻引用的網絡關係，探討其中心性與結構洞的分布。接下來這個部分則是進一步了解作者之間，如何透過所研究的治理次領域，與其他學者有所連結而成為雙維網絡⁹（two-mode）的中心者與捐客（表 11）。

首先，在 2001-2005 年，「O16」、「O24」、「O25」、「P38」因研究「治理理論」，而彼此連結在一起。前三位皆非在公共行政領域，而是政治、法律與國際關係學者，僅有「P38」為公共行政學者。但四位因為對於治理理論的研究，而彼此群聚（cluster）在一起，達到治理智識的轉移與分享。而「P1」、「P6」、「P7」與「P25」皆為公共行政領域的學者，其所研究的治理次領域也較偏向行政面向的「社區與協力治理」。而在 2006-2010 年，網絡的主要中心者前兩位仍然為非公共行政學者，但與後面幾位學者因透過「電子治理」議題，而連結在一起。在第三階段 2011-2017 年這段期間，是治理研究百花盛開的階段。每位行動者開始對於治理有各種不同的概念與興趣，因此開展出各種治理研究的次領域。而「社區治理」與「治理理論」這兩大傳統治理議題，仍是鏈結各個行動者彼此交流的重要主題。在「社區治理」議題中，「P39」是公共行政領域，而「O7O8O9」與「O37O38O39」皆非公共行政領域。然而，這群行動者因為對於社區治理的研究興趣。然而，這群行動者因為對於社區治理的研究興趣，而進入到同一個研究範疇內。其他治理研究的次領域，包括電子治理、環境治理、跨域治理、府際治理等，皆為公共行政之研究。在 2001-2017 年，可觀察到公共行政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彼此交流，成為治理發展將近二十年的中心者。「治理」在公共行政與其他領域的發展，由政治領域的學者開始對「治理理論」開啟研究後，公共行政學者接手開展實務上的應用。

相對於作者之間的引用在治理智識的轉移，公共行政學者形塑重要的範疇。然而在作者與治理次領域的連結關係中，行動者透過共同研究的次

⁸ 單維網絡（one-mode network）意指網絡中的節點（node）都是同一個單位屬性，例如都是行動者或皆為事物之中心性分析。

⁹ 雙維網絡（two-mode network）意指網絡中的節點由兩個單位屬性所構成，例如同時探討人與事件彼此的連結關係。

領域，而成為議題中心者的網絡分布，公共行政與非公共行政之界線則較不明顯。這意味著治理的次領域對於學者而言，只要有興趣便會進入其中參與相關議題，而不會考慮是否為公共行政領域以外的因素。但是對於作者之間的引用，公共行政學者大多仍會選擇同領域學者的論文，作為自身研究的支持證據。因此，學者在治理次領域中的網絡連結關係，更能看出智識流動的可能性。簡言之，治理研究的智識轉移在學界已開始有跨域合作或轉移的現象。然而，各領域仍有自己的專業論述。目前可觀察到已開始出現智識轉移的可能性，不同領域的學者也會進行同樣的治理議題。但真正達到智識擴散，仍需再經過彼此多元交流下，才能更完整的提升效益。

表 11 行動者與治理次領域之網絡中心者分析 (actor-event)

程度 中心性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7	2001-2017
1	O16 (治理理論) (0.357)	O5 (網絡治理) (0.200)	O7O8O9 (區域治理) (0.120)	P7 (政府治理) (0.265)
2	O24 (網絡治理) (0.357)	O6 (治理理論) (0.200)	P39 (民主治理) (0.120)	O25 (治理理論) (0.191)
3	O25 (治理理論) (0.357)	P27 (電子治理) (0.200)	O37O38O39 (城市治理) (0.120)	P5 (治理理論) (0.191)
4	P38 (治理理論) (0.357)	P28P29 (電子治理) (0.200)	O14O15 (政府治理) (0.080)	O13 (全球治理) (0.191)
5	P1、P6、P7、P25 (地方、政府治理) (0.143)	P27P22、O32 (電子、全球治理) (0.200)	O26O29O30 (政府治理) (0.080)	P12P13、P11、O1、P18 (網絡、跨域治理) (0.162)

註：P 代表公共行政學者；O 代表非公共行政學者。() 代表作者研究次領域。() 中的數字代表中心性網絡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下表 12 為探討作者在治理次領域與他者的連結，是否因為研究次領域的關係，而扮演與他者重要的專業傳遞之角色。在此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2001-2005 年，作者與此領域的中心性分析，占據主要角色的行動者大多為非公共行政領域的學者。然而，在扮演專業資訊傳遞的捐客角色，卻是以公共行政學者為主。誠如前述所言，在 2000 年初期，學者引用他者及此領域的中心性網絡以非公共行政學者為主。但在作者對研究次領域

的網絡，公共行政學者其實已經扮演重要的中介者角色。在 2006-2010 年、2011-2017 年，大多公共行政學者也在作者與治理研究次領域的網絡中，扮演捐客的橋樑（bridge）功能。然而，觀察整體網絡的分析結果，「P7」對於治理的貢獻度相對較顯著，其透過「社區治理」與「協力治理」等次領域，扮演網絡中捐客的角色。

表 12 作者與治理次領域之捐客網絡分析（actor-event）

捐客網絡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7	2001-2017
1	P2 （治理理論） (0.000)	O1 （跨域治理） (0.000)	P7 （政府治理） (0.000)	P13 （網絡治理） (0.000)
2	P3 （區域治理） (0.000)	P12P13 （網絡治理） (0.000)	P23P24 （跨域治理） (0.000)	P7 （政府治理） (0.191)
3	P36 （民主治理） (0.000)	P15 （都市治理） (0.000)	P25O10P26 （社區治理） (0.000)	P5 （治理理論） (0.207)
4	O13 （全球治理） (0.000)	P16 （民主治理） (0.000)	O11、P13 （網絡、民主治理） (0.000)	P18 （全球治理） (0.258)
5	P36P37O23 （民主治理） (0.000)	O6、P7、O33 （政府、風險治理） (0.000)	P33P34P35、O12、 O17O18、P41P42、 O28、P39P40、O33 （電子、全球、跨域、 理論、風險治理） (0.000)	O13 （全球治理） (0.285)

註：P 代表公共行政學者；O 代表非公共行政學者。（）代表作者研究次領域。（）中的數字代表結構洞網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同樣地，若從網絡圖來檢視作者與次領域的分布來看，下圖 2 在「作者」與「引用文獻次領域」的分佈，發現「治理理論」、「地方治理」、「全球治理」、「跨域治理」、「社區治理」等次領域，為臺灣發展治理研究十七年來，重要的五大議題。從 2001 年開始，政治學者在政治學領域相關期刊中陸續發表治理研究文章，扮演開路先鋒角色將治理理論引進臺灣後，公共行政學者相繼接棒「理論研究」的延伸，並向外拓展各種不同的治理議題。圖 2 可以清楚看到，治理研究相關次領域，並沒有很明顯的學術領域區隔性。公共行政學者對於治理前仆後繼的研究能量，也帶動連結非公共行政學者進入治理研究進行開發。然而，仔細觀察次領域的議題，對於

吸引公共行政與非公共行政學者的參與，仍有一些差異性。在「全觀治理」、「治理理論」、「區域治理」、「非營利組織」等主題，有較多的非公共行政學者投入其中；而在「全球治理」、「電子治理」、「民主治理」、「跨部門治理」等主題，則是以公共行政學者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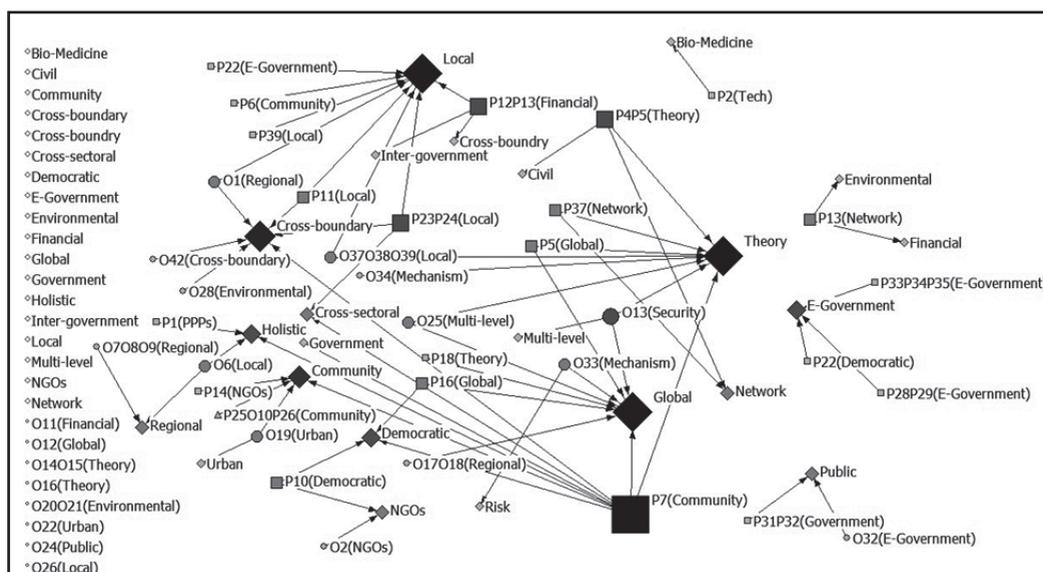


圖 2 作者與治理次領域網絡圖（2001-2017）

註：菱形代表作者引用文獻之次領域；方形代表公共行政學者；圓形代表非公共行政學者；三角形代表混合型學者。方形與圓形愈大者，代表作者在研究此領域中之中心性愈高；而菱形愈大者，代表此次領域被學者發表的次數愈多。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伍、討論

經由前述的分析，充分說明公行本身與相關領域在治理研究上的貢獻及聯結。在公行貢獻度的部分，整體而言，平均公行貢獻度在不同時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請參見表 4），以 2006-2010 年的平均貢獻度較高（0.51）；而就各別期刊觀察（請參見表 7），則以「行政暨政策學報」與「公共行政學報」的平均貢獻度較高（0.85；0.70）。直覺上，公行對於治理議題的

研究貢獻度應該可以超過 0.5，但實際卻只有 0.44，以下討論便著重於探討影響公行貢獻度的相關因素，進一步從作者屬性、期刊別及相互引用網絡的角度，來檢視影響公行貢獻度的可能原因。

首先，從作者的角度來觀察，影響公行貢獻度可歸因於兩大因素，即作者數與作者領域之間的結構。從表 13 得知，不同領域在作者數上具有明顯的分布差異，而呈現出兩項主要的特徵：一方面，純公行領域以單一作者為主（79.3%），兩位作者其次（13.8%），非公行領域雖同樣以單一作者為主（71.1%），兩位作者其次（21.1%），但是，兩者在結構的比例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跨領域作者（公行及非公行）則是以兩位作者最高（75.0%），三位作者其次（25.0%），而其平均公行貢獻度均超過 0.5。是以，就結構而論，整體的公行貢獻度應該可以超過 0.5，然而，在非公行作者的治理論文數量有絕對優勢的前提之下，整體公行貢獻度仍無法過半。換句話說，除了作者個人因素的影響之外，論文的數量多寡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表 13 作者數、作者領域之交叉分布（含公行貢獻度）

	純公行	跨領域	非公行
整體#	29	4	38
單一作者	79.3%	N/A	71.1%
兩位作者	13.8%	75.0% (0.76)	21.1%
三位作者	6.9%	25.0% (0.50)	7.9%

註：表格中百分比為直%；() 中數值則為平均公行貢獻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承此，若改以期刊的角度來觀察，影響公行貢獻度的原因便是論文投稿與接受的理由，也就是論文之所以會出現在這份期刊，究竟是投稿者的個人選擇？抑或是期刊編輯委員會的決定？然而，在既有出版品不可能記載此類資訊的限制之下，要證實上述的問題將十分困難。因此，作為替代方案，本研究檢視期刊別與作者領域的結構。從表 14 得知，不同領域在期刊別上具有明顯的分布差異，而呈現出的主要特徵是，純公行領域作者出現在傳統公行期刊比例較高，如「公共行政學報」（65.5%）與「行政暨政策學報」（24.1%），兩者就占了 89.6%，但是，非公行領域作者出現在傳統公行期刊比例卻也不低，如「公共行政學報」（21.5%）僅低於「政

治科學論叢」(26.3%)。就此而論，純公行領域的作者主要是出現在傳統公行期刊，而非公行領域的作者則可能出現在各個期刊，甚至是高比例出現在傳統的公行期刊，這樣的結果，若干程度有助於解釋整體公行貢獻度低於 0.5 的現狀。

表 14 期刊別、作者領域之交叉分布 (含公行貢獻度)

	純公行	跨領域	非公行
整體#	29	4	38
A	N/A	N/A	10.5%
B	N/A	N/A	7.9%
C	N/A	N/A	15.8%
D	3.4%	N/A	26.3%
E	6.9%	25.0% (0.67)	15.8%
F	24.1%	25.0% (0.67)	2.6%
G	65.5%	50.0% (0.58)	21.1%

註：表格中百分比為直%；() 中數值則為平均公行貢獻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此外，從作者間引用網絡的動態結構，亦有助於解釋公行貢獻的變動。結果顯示，在 2001-2005 年，非公共行政學者是文獻引用網絡中的重要中心者。然而，公共行政學者很快地接收到這樣的研究趨勢，故 2006-2017 年研究治理相關議題的行動者數量快速上升，並扮演了重要的中心者與捐客角色。同樣的情況在作者與治理次領域的網絡中，觀察到 2001-2005 年仍是以非公共行政學者為網絡中心，在 2006-2017 年間則轉換至公共行政的專業群體，形成傳遞不同議題的治理智識轉移中心。然而，與作者間的引用網絡之差異處在於，2001-2005 年間即使非公共行政學者扮演串連次領域的中心者，但公共行政學者卻間接成為作者與次領域之間的中介捐客。這意味著公共行政學者，具有快速掌握研究趨勢，以及應用實務分析的能力，傳遞相關專業知識至非公共行政領域的學者中。政治學者對於作者之間的引用，在初期具有指標性的作用。然而，公共行政學者對於治理次領域在網絡分布上，可以看到常扮演著個次領域中負責連結的中介者角色。相對於政治學者而言，公共行政學者較多扮演智識傳遞與轉移的行動者。

而在作者與治理次領域的連結網絡分析，中心性分析雖然以公共行政學者為多，但每個階段非公共行政學者也會鑲嵌於中心性網絡中。此現象

也說明了沒有特定的治理次領域是由公共行政或非公共行政學者所壟斷，而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的學者都會參與，對相關治理議題進行研究。而在結構洞的分析中，則發現公共行政學者扮演重要的智識傳遞與分享的角色。此結果意味著，公共行政在不同的治理次領域可扮演連結不同領域的學者之功能，也驗證了公共行政學科是一個較為應用的領域，可多方吸取不同領域的學科之治理經驗與實務。如同表 5 至表 7 中所示，無論論文的作者為單一公共行政學者，或跨領域的合作，對於治理研究皆顯示相當程度的貢獻，並有顯著的相關性。在本研究中對於智識轉移的探討，公共行政學者從政治學者間接學習治理概念，在眾多學者對於治理研究的大量投入下，在網絡分析中可看到許多公共行政學者有扮演連結者的資訊傳遞特質。

陸、結論

行政作為一項專業的工作，已是歷史悠久的既存事實，而被視為一門專業的學科，則是直到晚近才逐漸達成的共識。在各界的努力之下，經過百年的發展，形塑出今日公共行政的若干學科特質，讓應用性、相關性以及公共性成為當代公共行政研究明顯的特徵(Waldo, 1968; Bushouse et al., 2011; Nesbit et al., 2011; 陳敦源, 2005)。而其中，應用性的特質不僅幫助公共行政確立研究的利基，也引導相關性及公共性的發展。然而，卻也讓公共行政的研究過度地依賴其他學科的理論，而缺乏自我的核心理論 (Nesbit et al., 2011)，無法展現獨立學科的專業與價值 (Waldo, 1975)。

時至今日，在學者的努力之下，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與理論逐漸建立。但，卻鮮少研究進一步探討公共行政累積的研究成果或建立的研究理論，是否為其他學科所引用或借用。特別是與其理論母學（如政治學、管理學等）之間的知識連結，將更能彰顯公共行政學科價值與學術定位，而此類關於學科或領域發展現況的議題，正是目前研究公共行政研究的缺口。爰此，本研究嘗試著爬梳公共行政與非公共行政學科之間的智識連

結，將治理概念作為對話的平台與分析的場域，解構不同學科之間理論交流網絡，藉由蒐集 2001-2017 年政治學學門極具學術代表性的期刊（7 個 TSSCI 名單中期刊），並應用後設分析、書目計量學與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瞭解跨學科之間智識網絡結構與互動，以作為評估公共行政發展的判準之一。

對應前述所提的研究問題，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1. 關於政治學門中治理研究的發展趨勢，結果顯示從 2005 年開始才有大量的治理研究出現，而 2011 年達到高峰後，相關研究的數量便大幅降低；2. 在進一步檢視 71 篇論文作者的相關屬性之後，得知治理研究的作者大多為單一作者（70.4%），且以非公行領域的比例最高（53.5%）。而綜合考量論文之作者數量與領域所獲得的公行貢獻度，整體而言，平均公行貢獻度在不同時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請參見表 5），以 2006-2010 年的平均貢獻度較高（0.51）；而就各別期刊觀察（請參見表 8），則以「行政暨政策學報」與「公共行政學報」的平均貢獻度較高（0.85；0.70）；3. 在智識網絡的結構部分，若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觀察，結果顯示 2001-2005 年的治理研究主要以非公共行政領域的研究者為中心，大多屬於政治學、國際關係等領域，而其被引用之文獻網絡集中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進行治理研究的學者，大多成為日後網絡中的重要連結節點；若從期刊的角度來觀察，此時期的兩個公共行政領域的專業期刊（「公共行政學報」與「行政暨政策學報」），則是最高被引用的期刊；而從 2006 年開始，治理主題的智識網絡變得複雜，無論是研究者、期刊或主題都顯得更加多元，不同領域的研究者互有交流與互動，輪流扮演智識網絡的中心者與捐客。

就此而論，4. 關於公共行政在該智識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結果顯示即便治理研究初期投入的研究者為非公共行政領域的行動者主導。但是，接受治理主題的期刊則以公共行政領域為主，說明無論是研究者本身或期刊編輯委員會，均認為治理主題對於公共行政領域有著高度的重要性與契合度，而從智識網絡的動態發展歷程，則是再次說明公共行政對於治理相關理論發展的貢獻度。換句話說，從上述知識轉移的過程中，說明研究者所處的地理位置並沒有構成任何的阻礙，而治理概念的諸多特

質（請參見文獻分析），則反應在研究議題高度的廣泛度與包容性。另外，若依治理研究的次級領域來看，研究者也多以問題導向作為思考模式的來源，而非學科導向的研究模式，將有助於吸引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者投入研究，產生所謂的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此外，透過網絡遞移性（transitivity）亦有效地將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者拉攏，而形塑一個三角的緊密學術網絡。

整體而論，本研究嘗試透過循證（evidence-based）的邏輯，在實際資料的佐證之下，說明跨學科之間的智識流動，進而標定當代公共行政學科的學術角色與定位。雖然，在不同學科的傳統之下，研究者所受的教育與訓練均有所差異。過去研究認為不同學科的交流，容易形成「隔行如隔山」的溝通障礙，或是樹立「各說各話」的學術壁壘。然而，公共行政學者在治理研究中，則是成功地扮演跨學科學術社群對話的一個重要的傳遞功能與轉化知識的角色，成為該智識網絡中的捐客、中心者，以及結構洞的弱連帶角色。換句話說，就國內治理概念的擴散與連接而言，公共行政領域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而治理理論在臺灣大抵的發展軌跡可以解釋為，先由公共行政領域從外吸收養分，即概念「向內引進」（inbound）階段，接著是經歷理論的磨合及融合，再由公共行政領域對外輸出產品，即概念「向外輸出」（outbound）階段。簡言之，治理概念從非公共行政領域到公共行政領域，又從公共行政領域到非公共行政領域的轉移過程，展現了智識轉移的組織鄰近性。此促使治理概念能夠被「創造」、「應用」，進而衍生出多種治理次領域的蓬勃現象，作者之間也間接達到「分享」的成果。

最後，本文以跨學科智識流動為主題出發，嘗試描繪出臺灣公共行政領域智識結構與交流的大抵圖像，而作為一個初探性質的研究，尚有許多不足的地方需要進一步精進與改進。其中，值得提出討論的是，引文分析雖提供本研究一個良好的理論基礎，而有助於理解智識的流動與描繪流動的結構，但，引文分析僅能提供研究者關於論文引用者（A）與論文被引用者（B）彼此連結的資訊，而無法進一步呈現作者（A）援引之目的，是因同意他人（B）的論點而引用？還是因反對他人（B）的論文引用？以及作者（A）同意與反對他人（B）論點的程度。又如作者（A）援引

之目的，是出自於知識性目的（如同意或反對他人論點）或非知識性目的（如增加論文被接受率或自己作品引用數）？以上都是本研究尚未觸及與回答的議題，卻對於探索具備抽象性與廣泛性等特質之治理概念的智識流動十分重要。

準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的研究，在分析對象的部分，可以藉由擴大資料蒐集的範圍，以獲得更豐富及完整的資訊，具體的策略如下：1. 研究者如欲完整地拼湊治理概念在我國政治學門的發展與連結，建議可以將 TSSCI 名單中名稱沒有「行政」或「政治」關鍵字之期刊一併納入分析，如「問題與研究」、「選舉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臺灣民主季刊」等；2. 研究者如欲詳細地記錄治理概念在公共行政領域的發展，建議可以將非 TSSCI 名單中與「公共行政」相關的期刊一併納入分析，如空大行政學報、政策研究學報等，則可說明公共行政領域中治理概念的智識網絡；3. 甚至，研究者可以同時將前述的兩種研究對象一併納入分析。

此外，在分析方法的部分，亦可結合其他的質性資料分析或量化測量指標，以提升研究的效度，具體的策略如下：1. 研究者可針對論文援引的情況進行內容分析，進一步劃分援引的態樣，例如因同意或反對而引用？以及同意或反對的程度，藉此納入質性分析方法的優點，將有助於深入分析跨學科的智識流動與連結的內涵；2. 研究者亦可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或書目計量學的其他量化指標，以提供更加充分的證據，來衡量跨學科的智識網絡的轉移與分享。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光旭，2015，〈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應用〉，《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4：67-134。
- 江明修，1997，《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臺北：五南。
- 何中馨，2007，〈跨界的知識傳遞臺灣奧美廣告學習經驗之個案研究〉，《地理學報》，47：59-83。
- 施能傑，2013，〈公共行政學領域發展概況〉，吳玉山、林繼文、冷則剛（主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五南，頁 227-250。
- 柯佩均、熊瑞梅、盧科位，2012，〈臺灣社會學門專業期刊間引用網絡之結構分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9（4）：533-561。
- 孫本初，2013，《新公共管理（第五版）》，臺北：一品。
- 孫同文，1998，〈臺灣公共行政的研究成果的回顧與評估〉，《暨大學報》，2（1）：133-159。
- 袁大鈺、唐牧群，2010，〈跨領域學術社群之智識網絡結構初探：以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為例〉，《圖書資訊學刊》，8（2）：125-155。
- 莊文忠、張順全，2013，〈公共行政領域碩士論文主題與方法的研究趨勢—多層次分析觀點〉，《公共行政學報》，45：75-107。
- 陳世榮，2007，〈探究環境治理中的知識溝通：臺灣氣候變遷研究的網絡分析〉，《公共行政學報》，25：1-30。
- 陳重安、許成委，2016，〈公共服務動機：回顧、反思與未來方向〉，《公共行政學報》，51：69-96。
- 陳敦源，2005，《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臺北：韋伯文化。
- 陳敦源，2012，《民主治理：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調和（二版）》，臺北：五南。
- 詹中原，2013，〈我國公共行政典範之遞移與建構（2000~）〉，吳玉山、林繼文、冷則剛（主編），《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五南，頁 251-272。
- 蔡敦浩、李慶芳、藍紫堂，2004，〈知識管理路徑圖：一個整合性的新模式〉，《產業論壇》，6（4）：47-74。
- 謝儲鍵、陳敦源，2016，〈虛擬網絡行動者角色與政策審議品質關係之研究：一個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法的探索〉，《民主與治理》，3（1）：63-109。
- 謝儲鍵、林煥笙、陳敦源，2016，〈緊急災害管理中之協力網絡分析：以莫拉克風災災後的教育重建為例〉，《行政暨政策學報》，62：59-125。

二、英文部分

- Allen, T. J. 1977. *Manag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ndrews, R., and M. Esteve. 2014. "Still Like Ships that Pass in the Ni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31-60.
- Argote, L., and P. Ingram. 2000. "Knowledge transfer: 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ir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82: 150-169.
- Bathelt, H., A. Malmberg, and P. Maskell. 2004.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1): 31-56.
- Bevir, M. 2011a. "Governance as Theory, Practice and Dilemma." In M. Bevir ed., *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 London: SAGE, 1-16.
- Bevir, M. 2011b. *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 London: Sage.
- Burt, R. S. 1992. *Structure Hol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shouse, B. K., W. S. Jacobson, K. T. Lambricht, J. J. Llorens, R. S. Morse, and O. O. Poocharoen. 2011. "Crossing the Divide: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1 (S1): 99-112.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 Doreian, P., and T. J. Fararo. 1985. "Structural Equivalence in a Journal Networ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6: 28-37.
- Easton, D. 1965.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NJ: Englewood Cliffs.
- Findlay, R. 1978. "Relative backwardnes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 simple dynamic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2(1): 1-16.
- Frederickson, G. H. 1976. "The Lineage of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8(3): 149-174.
- Frederickson, G. H. 1999. "The repositioning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2: 701-711.
- Freeman, C. L. 1979.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Social Networks*, 1: 215-239.
- Fukuyama, F. 2013. "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 26(3): 347-368.
- Georgiou, I. 2014. "See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An atlas of 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4: 156-175.

- Gilbert, M., and M. Gordey-Hayes. 1996.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vation*, 16(6): 301-312.
- Golembiewski, R. T. 1977.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Developing Disciplin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 Goodnow, F. J. 1900.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Granovetter, M. 1974.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ant, R. M. 1996.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winter): 109-122.
- Henry, N. 1975. "Paradig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5: 378-386.
- Henry, N. 2010.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11th Ed.)*. New York: Longman.
- Holzer, M., V. Gabrielyan, and K. Yang. 2007. "Five Great Idea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W. B. Hildreth, G. J. Miller, and J. Rabin eds.,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rd Ed.)*. Florida: CRC Press, 49-101.
- Inkpen, A. C., and A. Dinur. 1998.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international joint-ventures." *Organization Science*, 9(4): 454-468.
- Lasswell, H. D. 1985. *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 New York: Meridian Press.
- Levi-Faur, D. 2012.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ynch, T. D., R. Omdal, and L. P. Cruise. 1997. "Secular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7(3): 473-487.
- Mitton, C., C. E. Adair, E. McKenzie, S. B. Patten, and B. W. Perry. 2007. "Knowledge transfer and exchange: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Milbank Quarterly*, 85(4): 729-768.
- Moreno, L. J. 1934. *Who Shall Survive?* Washington, DC: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mpany.
- Morgan, K. 2001. "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Geography: Localised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Studies Conference, September 20-23, Eindhoven: Netherland.
- Morgan, K. 2004. "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geography: learning, proximity and territorial innovation system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4: 3-21.
- Nesbit, R., S. Moulton, S. Robinson, C. Smith, L. DeHart-Davis, M. K. Feeney, B. Gazley, and Y. Hou. 2011. "Wrestling with intellectual divers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voiding Disconnectedness and Fragmentation While Seeking Rigor, Depth, and Relev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1(S1): 13-28.

- Ostrom, V. 2008.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Peters, B. G., and J. Pierre. 1998.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Rethin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8(2): 223-243.
- Pollitt, C., and P. Hupe. 2011. "Talking About Government: The Role of Magic Concept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3(5): 641-658.
- Raadschelders, Jos C. N. 1999. "A Coherent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9(2): 281-303.
- Rhodes, R. A. W. 1996.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11(4): 652-667.
- Riccucci, N. M. 2010. *Public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s of Inquiry and Philosophies of Knowledg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Shafritz, J. M., A. C. Hyde, and S. J. Parkes. 2004.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Storper, M., and A. J. Venables. 2004. "Buzz: 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 Urban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4: 351-370.
- Szulanski, G. 1996. "Exploring O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Winter): 27-43.
- Verkasalo, M., and P. Lappalainen. 1998. "A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Knowledge Utilization Process."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45: 414-423.
- Waldo, D. 1968.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30(2): 443-479.
- Waldo, D. 1975. "Political Science: Tradition, Discipline, Profession, Science, Enterprise."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S. Polsby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130.
- Wasserman, S., and K.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2nd E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 C., S. A. Boorman, and R. L. Breiger. 1976. "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Blockmodels of Roles and Po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730-780.
- Wilson, W. 1887.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2): 197-222.
- Zack, M. H. 1999. "Developing a Knowledge Strateg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1(3): 125-145.

附錄

表 A 作者所屬單位之領域分類表（公共行政領域）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所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註：表格中機構名稱按照筆畫由少至多進行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B 作者所屬單位之領域分類表（非公共行政領域）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所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系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長榮大學天然災害重建行政管理中心	南華大學社會學系
政大地政系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真理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
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崑山科技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暨南大學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銘傳大學國際學院新聞與大眾傳播學程	

註：表格中機構名稱按照筆畫由少至多進行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ploring the Knowledge Transf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The Connection of Governance Research

Chu-Chien Hsieh^{*} Teng-Wen Chang^{} Don-Yun Chen^{***}**

Abstract

As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 separated from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PS) in 1930s,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crisis is an ongoing subject of research that leads to Dwight Waldo's call for efforts to build distinct core values for PA to ease the crisis. However, as both fields moving into the "governance" er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ibling disciplines is worthy of scholarly attention.

In this research, the key question is to unveil "who influence whom" issue in the moving of concept "governance"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by tracking the publications from 2001 through 2017 of Taiwan Social Science Index (TSSCI) journals in the category of PS. The idea of meta-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echnique will be utilized to discuss 1) the developing trend, the percentage of publication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2) the dynamic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concerning the governance concep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collected in this research, first, the concept of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Center for Organization Research and Desig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Email: jeffhsieh920@gmail.com.

**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TWChang0119@gmali.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donc@nccu.edu.tw.

governance appeared in 2001-2005 through more than ten papers published in seven TSSCI journals in the beginning from 2001 through 2005, PS scholars bring the concept to the field such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However,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in 2011-2017, PA scholars flood in and help to popularize the concept in the academia. Third, through the network analysis of structural hole, the PA scholars not only play the critical role, but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broker as well. Especially for those PA scholars who are specialized in researching PPP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tributed the most.

Through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is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field of PA has play an critical role to introduce the governance concept to Taiwanese academia by shaping the knowledge flow and transforming from “inbound” of receiving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into PA field to “outbound” of affecting scholars in adjusting fields. The unique role of PA as knowledge broker in the field of PS is realized.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haring, meta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governance

